

从“兴趣爱好”到“职责使命”

殷雪年

从前，文物于我，是书斋展卷的雅趣，是旅途驻足的惊艳；而今，它已然化作一份“为国护宝”的沉甸甸的事业与担当。

与省内、国内诸多文物资源大市相比，大同的文物，不在其多，而在其重。云冈石窟的雄浑造像、华严寺的古朴殿宇、善化寺的飞檐斗拱、悬空寺的奇绝构架……一砖一瓦、一石一木，都镌刻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印记，承载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文化密码。这份厚重，令我们每一项决策的酝酿、每一项工作的推进，都心怀敬畏、如履如临。

大雨中的抢救：与时间竞速

今年的大同，雨季格外漫长，降水量达到平常年份的两倍有余。往日里骤来骤去、爽利如风的雨，此番却缠绵不休，密织如愁。雨水无情地冲刷着长城的古老夯土，渗入古建斑驳的墙体。面对自然的侵蚀，我们时常陷入被动防御的无奈，却从未有过一丝一毫的退缩。

这个漫长的雨季里，大同文物人的拼劲与韧劲，屡屡令人热泪盈眶。全员上阵，连夜部署，排查险情，消除隐患，我们以最质朴也最赤诚的方式，为那些饱经岁月风霜的文物古建、历史遗迹遮风挡雨。

纵使倾尽心力，仍有部分古建在暴雨中受损。这份遗憾，终将化作我们日后深耕精细化文物保护的不竭动力。文物，经不起半点折腾与等待；守护，本就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而经历了这场和时光的竞速，我们更要让这些承载着千年记忆的文物持续焕发新的光彩。

探方里的回响：触城脉过往

考古，从不是猎奇式的“寻宝”，而是一场唤醒文明记忆的探寻。

从夏至秋，我一次次来到大同市区的一处考古发掘工地。因为要新建一所学校，这里深埋着的120多座北魏墓葬得以重见天日。

站在探坑边缘，思接古今，心绪如潮，真是一种奇妙的体验。这片密密匝匝布满深浅不一探坑的土地，将来会成为孕育希望、洋溢青春的校园。考古队员们在这片希冀之地，触摸着时光的脉搏。他们剥开层层泥土，小心翼翼地捧出一尊陶俑、一方古砖、一截残石……仿佛是从历史长河中打捞文明碎片，拼接还原那些尘封千年的故事。

这不仅是一次抢救性发掘，更是“先调查、后建设”“先考古、后出让”制度在大同的生动实践。这一年，我们完成170项共计280万平方米的考古调查勘探，承担了11个考古发掘项目。400多座墓葬、250多处灰坑、近8000平方米遗迹——这组数字的背后，是文物人夜以继日的坚守。城市的脚下，处处皆是我们精心呵护的文化积层。

古今间的对话：为文物延年

文物保护，是一门严谨的科学，也是一门深邃的哲学。

这一年，大同文物保护修缮工作步履坚实。华严寺、悬空寺、善化寺，这些名字，不仅是大同的文化名片，更是国之瑰宝、全人类的文化遗产，这3处国保单位的4项保护项目计划书已完成编制；恒山建筑群等4处省保单位修缮工程立项报告亦已上报；禅房寺塔砖等15项文物保护修缮工程、华山供销社等24处低级别文物保护工程、巨乐堡北堡墙等6项长城抢险修缮工程，均已顺利竣工。

每一份方案的反复论证、每一组数据的精准核算、每一项工程的精心组织，都凝聚着文物人的心血与汗水。这是一种“修旧如旧”的智慧。我们与古代的能工巧匠隔空对话，读懂他们留下的榫卯密码，延续建筑的生命脉络，更让今人得以聆听历史的回响，传承文明的基因。

科技的力量，更在重塑文物保护的边界。我们邀请水



外国游客在大同市雕塑博物馆参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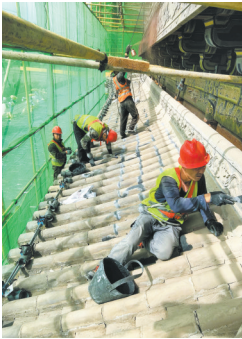
华严寺景区游人如织



大同北小城雨季抢险加固



青少年研学活动



大同北城墙防洪楼瓦面修缮



考古发掘现场

利部、中国科学院专家，运用前沿技术监测评估华严寺、九龙壁的水患风险，对天宫楼阁的稳定性开展无损检测，以数字化手段复原千年前的盛世容颜。当古老建筑邂逅现代科技，既实现了对历史的精准留存，更赋予文物走向大众的底气。

文脉里的新生：助大同出圈

大同的文物，从来不是尘封的标本，而是牵动城市脉搏的鲜活力量。在这个火爆出圈的旅游季，千年文脉与时尚相拥，八方来客感受到了大同的厚重与浪漫。

华严寺、善化寺内，游客们驻足流连，与古建对望、与文物对话。大同博物馆热度高涨，循着文物的脉络，能够感知平城时代的盛世风华。处在闹市的九龙壁、关帝庙、府文庙开启夜游模式，这是文物与生活最好的相逢。

以游客为中心，各文物景区、文博场馆服务的温度体现于每一处细节。华严寺、善化寺、九龙壁的智慧管理平台落地，MR互动体验让游客的观感更加清晰，《营造匠

心》多媒体展厅则将古建营造的密码一一拆解。紧抓过境免签机遇，我们扩充外语讲解员队伍，升级多语种语音导览，添置AR导览设备，让大同的故事被全世界听见。连续五届的“曾竹韶雕塑艺术奖学金”入围作品展览、青少年雕塑作品展览，更引来艺术界瞩目，让文博薪火在年轻一代心中点燃。

据不完全统计，大同市9家文物景区、文博场馆2025年累计接待游客950万人次。这个数字昭示着千年文脉从未远去，正以蓬勃姿态，为大同文旅的出圈之路持续注入力量。

回望2025，点点滴滴汇成一道生生不息的暖流。作为一名“新文物人”，我既是管理者，亦是守护者——既要引领大同文物队伍行稳致远，也要守护好这片土地上的文物瑰宝，让它们在岁月长河“活”得更久、传得更广。我深知，文物人守护的不仅是文物本体，更是一种“择一事、终一生”的工匠精神，一份“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

（作者系大同市文物局局长）

山东省文物系统真抓实干，砥砺奋进，推动全省水下文化遗产保护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成为助推山东文化强省、海洋强省建设的重要引擎。

提高站位，强化工作机制

强化机构队伍建设，为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新增编制35人（总数达到50人），成立山东省涉水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会，组建省级水下考古物探队伍。省政府公布“威海湾甲午沉舰遗址”为山东省“水下文物保护单位”，依据新修订文物保护法制定了保护措施。与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共建北海基地（二期）。省文物局与山东海警局建立水下文物保护协作机制，开展联合执法巡航行动。2023年7月，全国考古工作会议在山东召开，国家文物局与山东省人民政府签署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战略合作协议。

陆海统筹，做强水下考古研究

围绕海洋强国和黄河重大国家战略、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在沿海地区和大运河、东平湖等内水区域开展水下文物资源普查调查，基本摸清重点水域文物分布状况，新发现“褚岛一号”沉船遗址、青岛马蹄礁灯塔等重要遗存100处。完成威海湾甲午沉舰水下考古，出水定远舰铁甲、靖远舰舷窗、刻有“来远”舰名的镀银铜勺等文物4000余件，填补国内大型近现代钢铁沉舰考古空白，为甲午战争、世界海军舰艇史研究提供了实证。围绕“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开展垦利海北、利津铁门关等遗址考古发掘。深化研究阐释，创刊《海岱考古》期刊，填补了山东没有正式考古专业期刊的空白，出版《山东明清海防遗址调查报告》《海岱遗珍》等一批专著。开展交流合作，举办全国水下考古论坛、秦汉海疆考古与秦汉文明、甲午沉舰水下考古等学术交流活动，联合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开展南非沉船水下考古发掘，实现山东涉外水下考古新突破。

活化利用，推动保护成果惠及民众

实施明清海防遗址、海丝遗产等保护利用工程，“军地共建 活化利用——刘公岛甲午战争纪念地建筑群保护利用项目”获第四届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优秀案例，长岛北庄遗址、威海留村石墓群等列入省级考古遗址公园名单。加强展示传播，举办“铭记历史——甲午战争130周年暨甲午沉舰水下考古展”，累计接待观众200万人次，获第七届山东省文化创新奖。发布“千里海疆行”主题研学线路，开发“好客山东·半岛1号”海上游特色产品，助力水下文化遗产与旅游深度融合。

“十五五”时期，山东将强化工作机制，筑牢保护底线，挖掘文物价值，创新活化利用，为谱写水下文化遗产保护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贡献力量。

（山东省文物局）



威海湾甲午沉舰水下考古

本版责编：续红明 李 端 严小雅

数字赋能革命文物：既要“技术焕新”，更要“价值归真”

易筱雅 蔡云楠 柯嘉铠

近年来，国家将革命文物数字化展示与智慧纪念馆建设提升至保护利用的战略高度，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文件，明确要求创新革命文物传播方式，推动活化利用。这一部署既是顺应新技术条件的现实选择，更是落实文物工作要求、推动革命文物保护利用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从根本上看，数字化并非简单的手段更新，而是革命文物如何更好“被看见、被理解、被传承”的重要议题。

革命纪念馆承载的不仅是历史信息，更是红色基因与精神价值。这类纪念性场所正是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斯所界定的“记忆之场”。长期以来，纪念馆正是依托相对稳定的实体空间，通过庄重的展陈秩序与仪式化的参观体验，承担着这一记忆功能。而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介入，这一记忆承载方式，正逐渐向更加开放、流动的数字环境延伸。

当前，实体场馆、线上平台与社会舆论之间，正在形成一个相互联动的记忆传播网络。革命历史不仅存在于展柜与说明牌之中，更是进入屏幕、平台与互动场景，被频繁地观看和讨论。然而，在传播广度显著提升的同时，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当革命文物更多运行于数字环境中，其历史分量、精神厚度与文物真实性是否还能够得到充分保持？

从“在场”到“在线”：拓展革命文物的可见边界

数字技术首先改变的，是革命文物被“看见”的空间方式。高精度扫描、三维建模等手段，使许多地处偏远、受制于交通条件的革命旧址与文物，得以跨越物理边界进入公众视野。例如，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通过精细化数字采集推出线上漫游，使原本“必须到场”的历史资源，在数字环境中获得持续呈现。延安革命纪念馆围绕重点事件建设专题数字资源库，使一些受展陈面积限制的内容得以被更完整地保存和反复阅读。

这种变化，显著提升了革命文物的可及性和传播效率，但需看到，当文物从“在场之物”转变

为“可传播的信息”，其历史体验也随之发生变化。通过屏幕观看虽清晰，却易因缺乏在场感而显得“轻盈”甚至“单薄”。

实体展柜前的凝视，本质上是一种对历史真实的“触碰”，而数字呈现则更多依赖视觉理解。这要求纪念馆在放大“可见性”的同时，更加自觉地守住革命文物的精神底色。

从“共处”到“独览”：重构历史体验的仪式感

在实体纪念馆中，参观并非信息的自由获取，而是一种被精心设计的整体体验。参观动线塑造时间秩序，展陈节奏引导情感递进，群体在场所形成的共享氛围，使个人感受自然汇入公共记忆之中。

在实体纪念馆的体验之所以具有精神张力，很大程度上源于其集体性的参与方式。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指出，仪式通过“集体的共同参与”生成一种超越个体的情感能量，即“集体欢腾”——当人们在同一空间中依照共同的参观秩序行动、肃立与凝视，个体的情绪便被自然地带入共享的价值氛围之中，历史记忆也因此获得了超越个人感受的公共意义。

进入数字环境后，这种体验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历史信息更多通过手机、电脑等终端被观看，页面跳转、视频播放与算法推荐，打破了原有的叙事连续性。观看变得更加自由，也更加碎片化。近年来，一些革命纪念馆引入VR/AR技术增强代入感。例如，遵义会议纪念馆尝试将重要历史场景进行数字复原，强化情境呈现效果。从实践看，这类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数字环境中“沉浸感不足”的问题，但其体验仍主要发生在个体层面。

与实体空间中由集体参观与共同沉默所形成的公共仪式相比，数字界面提供的是一种个性化、即时化的观看方式。这种体验结构的变化，使纪念馆作为公共记忆锚点所承载的庄重性与社会性面临被削弱的可能。数字技术应当成为重建

仪式感而非解构仪式感的工具。如何设计互动让个体浏览汇聚成集体共鸣，是数字时代纪念馆体验重构的关键课题。

从“线性”到“碎片”：重拾历史叙事的整体性

数字平台的介入，不仅改变了传播的介质，更深层地重构了革命记忆的话语逻辑。传统纪念馆依托策展，构建“线性叙事”，将历史事件置于宏大时空与价值框架中阐释，保证了认知的完整性与思想深度。

然而，数字传播环境中，革命历史日益呈现“碎片化”特征，历史叙事的整体性面临被“去语境化”的挑战。短视频与社交媒体的传播特性，倾向于将复杂历史简化为独立的视觉片段或情感爆点。原本完整的历史叙事被拆解为脱离语境“高光时刻”，而其间的政治背景、思想动因与历史进程，在快速浏览中被忽略，导致历史叙事丧失整体性与纵深感。

这一变化呼应了传播学者伊尼斯提出的“媒介偏向论”：不同媒介在时间与空间维度上的偏向，会深刻影响知识的组织方式。具体来说，不同传播媒介对历史记忆的影响，并不只是传播多少的问题，更关系到如何被理解。当革命历史更多依托以速度与扩散为优势的数字平台传播，其表达方式往往更偏向即时呈现与片段获取，而相对削弱了对时间脉络和整体结构的耐心建构。

因此，数字环境下的真正挑战，在于如何在碎片化传播中重建历史叙事的整体性。技术可以跨越山海，带来海量的关注，但绝不能让生动的革命史变成破碎的“素材库”，不能让深沉的家国情怀被稀释为快餐式的网络情绪。

从“流动”到“沉淀”：守住革命记忆的历史分量

在高度媒介化的社会中，另一个需要深思

的议题是革命记忆的“景观化”风险。在实体纪念馆中，记忆之所以有分量，源于其具有一种“阻滞感”——观众需要付出时间、体力和专注力，在凝视与沉思中完成对历史的体认。这种认知的艰辛感，恰恰是理解革命艰难历程的心理基础。

而在数字环境中，流畅高效的交互设计与高度美化的视觉呈现，往往致力于消除这种“阻滞”。革命文物有时被转化为精致、时尚的视觉符号或文创元素，在滤镜与特效的加持下流于浅表化。

这种高度优化的传播模式，虽然能拉近青年群体与红色文化的距离，但也暗含着将严肃历史“审美化”的隐忧。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中提出：当历史与现实被转化为可消费的形象，真实关系便被表象取代。同样，在平台传播与消费逻辑的共同作用下，革命符号越来越容易被转化为可以快速观看、转发和评价的视觉形象。而当历史更多以“好不好看”“能不能传播”为衡量标准，其作为公共记忆载体的价值，便存于被表层化乃至消费化的风险。

当革命斗争的残酷性被精美视觉遮蔽，“打卡”的意义大于“受教育”，革命记忆可能失去其粗粝质感与痛感，沦为缺乏精神刺激的“文化快消品”。

因此，对“打卡化”和符号消费的担忧并非否定数字传播，而是提醒我们：当传播逻辑主导意义生成，“记忆之场”的历史密度与公共性可能被削弱。守住分量，即防止革命历史在过度符号消费中被抽空内核。真正的传承，应超越视觉愉悦，指向灵魂的触动与反思。

在虚实共生中守护历史的重量

进入数字时代，革命纪念馆的使命并未改变。无论媒介形态如何更新，其根本仍在于保护历史真实、凝聚公共记忆、传递核心价值。

理想的状态并非以数字技术取代实体空间，而是在二者之间形成张力与互补：实体纪念馆以其在场感与仪式感发挥“记忆之场”的锚固作用；数字平台则拓展记忆传播半径，让革命精神在更广阔空间中被持续理解和讨论。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在实践中把握好尺度与方向。一方面，以数字技术这一新质生产力为支撑，拓展革命文物传播的广度与触达能力；另一方面，更要坚持内容导向与价值引领，防止技术应用滑向形式化与娱乐化。

在技术赋能层面，构建全方位数字体验体系。针对“可见性”挑战，建立“数字引路—实地深化”的双轨机制，提升革命文物的可及性；针对仪式感缺失，开发同步在线参观等功能，重建数字时代的集体参与体验；通过技术手段弥合虚拟与现实、个体与集体之间的体验鸿沟，使数字技术真正服务于历史记忆的深度传承。

在价值守护层面，完善多层次内容保障机制：针对“碎片化”风险，构建“基础事实—历史语境—整体脉络”三级叙事体系，确保历史认知的完整性；针对“表层化”隐忧，设立数字内容伦理审查制度，嵌入“深度阅读”与“历史反思”环节，引导观众超越视觉表象；建立“数字足迹—实地溯源”转化机制，将线上互动引导至线下深度体验，守住革命记忆应有的历史分量与精神厚度。

在具体实践中，应注重提升策展人员的数字叙事能力，建立数字展陈内容审核与评估机制，守住价值底线；并推动线上线下联动，引导观众从“屏幕观看”走向“实地体认”，使数字环境成为通向实体记忆之场的桥梁。

让革命记忆在不断流动中保持分量，关键在于传播规模的扩大，而在于始终尊重历史的复杂性，维护公共记忆应有的深度与庄重。在数字环境中延续“记忆之场”的力量，是革命文物数字化必须坚守的价值方向，也是面向未来不可回避的课题。

（作者单位：广东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